

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研究*

杨鲁慧牛建

摘要：美日同盟在自主-安全交易基础上建立，之后由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美日的自主与安全诉求也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双方不断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协调利益。联盟成员的实力是自变量，其引起成员国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以此为基础，本文预设了美日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1）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2）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3）利益重合性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本文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总结出了非对称性联盟内国家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美日同盟得以不断调整并深化发展的原因不仅仅是美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选择，更是美日之间互动交易的结果，美日通过自主-安全交易各取所需。

关键词：美日同盟自主诉求安全诉求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7)02-0044-58

美日同盟成立至今已经六十多年，经历了冷战的全过程及冷战结束后的动荡，但美日同盟却没有因为共同威胁的消失而解体，相反却通过不同形势下的调整实现了联盟的强化，其原因究竟为何？美日同盟自建立之后的发展趋势表明，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在美日同盟内的地位不断提升，由依附国逐渐演变为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为何不断满足日本的自主需求，日本如何在同盟内实现地位的提升，美日之间如何实现利益的协调？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立足于美日同盟的利益重合性，从联盟内探究美日同盟为何呈现如此的发展态势。

一、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与假设的提出

联盟(Alliance)是实现国家利益最常用、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自人类产生以

*本文系教育部重点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资助项目“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与‘一带一路’国别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联盟便在战争与冲突中应运而生。无论在国际社会实践,还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联盟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各主流理论学派都定义了联盟的概念。从他们对联盟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研究的一些共识,同时也是联盟的基本特征:(1)联盟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区别于非国家行为体;(2)联盟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合作获得更多的安全收益;(3)联盟有明确的指向对象,指向联盟外的国家或威胁。

本文认为,联盟是主权国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正式协议确定的安全合作关系。联盟的共同利益表现在应对共同的敌人或威胁,利益可以不一致,但是利益具有互补性。由于联盟之外的安全合作种类繁杂,难以将所有现象都准确概括到一个定义里,也为了理论分析的科学性,本文研究的联盟只限于拥有正式合作协议,且正式的合作协议对联盟内的国家具有约束力的联盟。就联盟涉及的范围而言,本文认为联盟合作的基础与核心内容是军事安全合作,在军事安全合作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其它合作也是联盟的一部分,但必须以军事安全合作为主,且为最初的动力。此外,本文借鉴了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对联盟的研究成果,认为联盟最初建立时是一种合作关系,但通过联盟内国家的长期合作,这种合作关系逐渐丰满,从书面的协定演变为丰富多彩的合作形式与内容,上升为一种合作的机制,这种机制降低了联盟内国家的交易成本,同时促进了联盟内国家集体认同的形成,这些因素在无形中影响了国家的行为。所以,不仅仅是国家选择了联盟,联盟同样也会影响国家的选择。

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最早由迈克尔·艾德夫(Michael F. Altfeld)提出,艾德夫借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将国家决策者假定为理性行为体,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并且国家的决策偏好是一个集体选择,通过集体选择形成一个最终的决定,这意味着国家是一个单一行为体,国家在决定联不联盟时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的大小,国家的决策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艾德夫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提出了三个具体的参数:“国家安全、平民财富和自主权,国家安全是加入联盟的预期收益,平民财富和自主权是国家为了增加安全加入联盟的成本”。通过验证,艾德夫证明了国家选择联不联盟时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这是国家选择联盟时的固定行为模式,联盟是国家通过让渡自主换取更多安全的手段,安全是国家选择联盟的最终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艾德夫的自主—安全交易

本文对联盟和同盟的概念没有作明确区分,行文中两个概念通用。

Michael F. Altfeld, "The Decision to Ally: A Theory and Test", i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84, Vol. 37, No. 4, 1984, pp.523-544.

模型认为国家的自主与安全收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认为国家要想获得安全，必然会牺牲掉自主。例如，联盟给成员国提供了更多的安全，同时需要国家在一些问题上立场一致，这必然影响了国家在相关政策选择中的自主性，尤其是小国往往必须趋同大国的立场，自主便成为了安全收益的代价。

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在艾德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莫罗指出了传统的联盟理论的缺陷，传统的联盟理论认为联盟建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或者是为了制衡威胁，国家结盟后会获得更多的力量来对抗敌人，制衡威胁，会获得更大的安全。但事实是有的国家在加入联盟后，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安全，反而变得不安全了，例如非对称性联盟中大国不会因为和小国的联盟增加自己的安全，反而会因为小国增加了自己卷入冲突的可能，降低了安全。那大国为什么还会选择和小国结盟呢？而且传统的联盟理论认为联盟共同的敌人和威胁消失后，联盟便会瓦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传统的联盟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莫罗继承了艾德夫提出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深入论述了联盟中存在的自主—安全交易，提供了与传统解释模型不同的另一种解释模型，可以更加全面、贴切地解释国家的联盟行为。

莫罗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定义了安全和自主的概念，他假设国家的外交决策和行为都致力于实现自己追求的价值理念，国际社会中的冲突和问题是不同国家间价值理念的冲突导致的。然而国家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不仅仅是由其追求的价值理念决定的，同时也由国际社会中国家所处的位置决定，即由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决定。如果国家认为当前的某一国际现状符合自己的价值理念，那么它维持这一现状的能力就被称为“安全”，如果国家认为当前的某一国际现状不符合自己的价值理念，那么它改变这一现状的能力就成为“自主”。国家的“自主”与“安全”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莫罗认为国家利益可以二分为自主利益与安全利益，联盟是国家利益的反映，所以联盟反映了国家的自主、安全利益。国家在选择加入联盟后，其所处的位置会发生变化，所以对现状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国家的自主、安全利益会发生变化。同时，由于国家是通过协议达成的联盟，所以联盟内国家会就许多问题达成妥协，在这个妥协的过程中国家间会进行自主与安全的交易，因为“一国要想在某一问题上维持现状，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就必须在另外的问题上进行让步，这必然会造成自主利益的损失，所以联盟内存在自主—安全交易”。值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得注意的是,莫罗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建立在联盟内国家之间的互动基础上,所以虽然国家的自主与安全利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通过交易之后,国家的收益会发生多种可能,不同国家可以同时收获安全或者同时收获自主,也可以一些国家获得安全,另外的一些国家获得自主。例如对称性同盟中,所有的国家都能从联盟中收获安全或自主;非对称性同盟中一国从联盟中收获安全,另一国从中获得自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莫罗对艾德夫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的发展。

兰多夫·西沃森(Randolph M. Siverson)和斯塔尔(Harvey Starr)在莫罗的研究基础上,从个人层次考察了国内因素(即决策者对于增加安全与保持自主性认知的结果)对结盟行为的影响。通过量化研究,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外来势力的影响、国内革命和非暴力行为都会影响决策者对于增加安全与保持自主性的认知,进而影响国家的结盟行为;同时,这些因素也可能导致国家政权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国家结盟行为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细化了莫罗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内容,同时也证明了这一分析模型的有效性。

由于莫罗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更加全面,既适用于对称性同盟又适用于不对称性同盟,所以本文将莫罗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为基础,对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本文运用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有以下三个基本理论假设:(1)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在选择联盟时是基于自主、安全收益考虑的;(2)国家通过正式的协议建立同盟,同时也通过正式的协议协调利益、形成自主与安全的交易;(3)联盟内国家间的利益可以不同,但是需要互补性,这种互补的利益使得交易成为可能。此外,本文认为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不仅仅是一种分析联盟行为的工具,它在实践中已经成为联盟管理的一种机制并规范、引导、约束成员国的行为,保证了成员国在联盟内利益与战略目标的协调,交易的形成意味着成员国在相互妥协后达成了一致,保证了成员国行为的一致性,促进了联盟的维持和稳固。

美日同盟是正式的双边安全同盟,美日同盟关系间存在着自主—安全交易,是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典型案例,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适用于美日同盟的研究,二者结合在一起研究相得益彰。为了便于研究,深入了解美日同盟内的自主—安全交易情况,本文根据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理论,以联盟成员

Model of Allianc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 “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No. 1, 1994, pp. 145-161.

国实力对比为自变量,以其发生变化后国家自主、安全选择的变化为因变量,预设了研究美日同盟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问题假设:

假设一:日本自主扩张倾向明显,“挑战”自主—安全交易。

联盟内随着成员国实力的变化,最初的平衡会被逐渐打破,形成新的平衡;或因管理不善,联盟破裂。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也随着成员国实力的变化不断地重复交易,以实现联盟内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具体到美日同盟中,日本是美日同盟中的依附国,在美日同盟建立之初完全被美国控制,但随着实力增长后,日本的自主扩张倾向明显,一直试图改变美主日从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政治地位,这无疑会改变美日同盟最初的格局,“挑战”联盟之前已有的自主—安全交易。

假设二:美国纵容日本自主扩张,“调节”自主—安全交易。

由于依附国实力增长的速度快于主导国,依附国实力增长的实现相较于主导国更容易,所以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后,主导国虽然国家实力仍明显强于依附国,但较之前的优势会逐渐减少,形成了实力的相对削弱,这种相对的实力削弱和依附国利益诉求的增强,促使主导国联盟政策发生变化。具体到美日同盟中,美国是美日同盟中的主导国,其在美国日同盟建立之初完全控制着日本,但随着日本实力增长,美国实力相对削弱后,作为联盟内的既得利益者,其不希望美日联盟破裂,而是继续维持同盟。所以美国做出了让步,维持了联盟的运作,以继续利用同盟从中获益,在美日同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中起到了“调节”的作用。

假设三:利益重合性是美日同盟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

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模型将国家利益二分为自主利益和安全利益,国家在选择联盟时会评估自主与安全收益,所以国家利益是结盟的动机和目的,如果国家利益不同或者难以协调一致,那么国家间的自主与安全交易便不会形成,联盟也不会建立;但如果国家间利益一致或者利益具有互补性,双方合作后都能获益,那么国家间便会进行自主与安全的交易,联盟便会建立。美日同盟建立之初,日本急需美国保证其在战败后的安全,美国需要在日本保留军事力量支撑其建立战后的国际体系,双方的利益具有互补性;之后,随着冷战的开展,日本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国力迅速增长,二者互相利用,可谓是实现了共赢;冷战结束后,双方虽然也有冲突和摩擦,但是利益的重合性仍然很大,美国需要日本配合其全球战略的实施,日本需要借助美国提升政治地位,实现国家“正常化”,这保证了美日同盟的维持和合作的深化。

二、日本的自主扩张“挑战”自主—安全交易

联盟成员国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会不断地进行自主—安全交易,以实现联盟内的利益平衡。依附国在实力增长后,在自主—安全交易中的预期收益会发生变化,期望在安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收益更多的自主。同时,由于依附国一直在联盟管理中有被“抛弃”的恐惧,在实力增长后这种恐惧也会增加,促使依附国加大力量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所以,依附国在实力增长后,自主倾向明显,希望在自主—安全交易中获得更多收益,对已有的自主—安全交易形成了“挑战”。具体到美日同盟中,日本是美日同盟中的依附国,在美日同盟建立之初完全被美国控制,但在日本实力增长后,其自主扩张倾向明显,试图改变美主日从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无疑会改变美日同盟最初的格局,“挑战”联盟已有的自主—安全交易。

(一) 依附国实力增长后的自主—安全选择

第一,对自主的期望增加。国家自主是指不受别国支配和影响,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事。按照莫罗的定义,如果国家认为当前的某一国际现状不符合自己的价值理念那么它改变这一现状的能力就成为“自主”。国家的自主行为根据实力和意志两个要素判断。从实力来讲,国家在实力增长后,拥有了更大的改变现状的能力,为了追求自己的价值理念,会很自然地运用增长的实力来改变不符合自己理念的现状;从国家意志来讲,每个主权国家都希望自己主权独立,不受外来力量干预和影响制定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并且独立自主地实施自己的政策。但国家处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系统中,一国很难完全按照自身意志来实施自己的政策,其政策实施之后很可能影响到别国的利益,所以在制定政策中也会考虑对别国的影响,别国也会通过各种途径来干预其决策。尤其是小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较低,对国际格局影响力很低,但又必须适应大的国际格局,所以其自主性往往比大国小。因此,国家在实力增长后,拥有了实现国家意志的物质支撑,其自主意识会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第二,在安全层面被“抛弃”的恐惧增加。国家在选择是否加入联盟时,会对收益进行评估,当预期收益大于所负担的成本时,联盟便会成立。而一旦同盟成立,同盟国之间就会进行广泛而持久的讨价还价,以实现同盟利益的最大化,应对敌国的安全挑战。这便会产生“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恐惧,国家加入

肖晞,王立名:“冷战后美日同盟:从‘漂流到’强化”,载《现代日本经济》2006年第3期,第13页。

联盟后必须要表现出其对于盟友和联盟的价值和作用,否则便会被盟友“抛弃”;国家为了不被“抛弃”,积极承担更多责任和义务,容易因为盟友陷入一场与自己利益不相关的冲突中,产生“被牵连”的恐惧。所以,国家加入联盟后,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表现自己的价值,又不能过于表现自己的价值,承担更多的责任,二者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形成了“联盟困境”。

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对“抛弃”的恐惧加大后,往往会采取承担更多责任的手段来证明其对于联盟和盟友的价值,保证其不被盟友“抛弃”。同时在国家安全方面,依附国既希望利用同盟保障自身安全,又由于对主导国不信任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希望通过发展自身实力保障安全。

(二) 日本对自主—安全交易的“挑战”

第一,增加自主,扩大收益。依附国在联盟建立之初是通过牺牲自主作为代价加入同盟的,虽然收获了安全且收益大于成本,但整体来说,依附国在联盟建立之初的自主—安全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获益少于主导国。所以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后,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改变不利于自己的交易格局。表现为两种交易选择:第一种是在安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自主支付的成本;第二种是通过支付一定的公共产品和安全成本换取更多的自主。依附国的这种利益诉求无疑对联盟建立之初形成的自主—安全交易局面形成了挑战。在第一种交易选择情况下,依附国在安全收益不变的情况下,希望减少自主成本的支出,这需要主导国在支付的安全成本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让出部分的自主收益。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这是极不愿意看到的交易局面,所以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很难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依附国希望通过支付一定的公共产品和安全成本换取更多的自主,这需要根据主导国的实际需要判断,如果主导国需要依附国分担安全成本,便会让其可以接受的部分自主收益,联盟内新的自主—安全交易也会形成,联盟会继续维持;如果主导国实力仍然处于上升期,有富裕的安全资源来保障联盟的安全,那么主导国便不会妥协,也不会让出自主收益,联盟新的自主—安全交易不会形成,旧的交易也会动摇,联盟会处于动荡期。

第二,改变美主日从的不对等地位。依附国追求自主收益的增加,会使得依附国在同盟中的地位发生变化,改变依附国与主导国的关系。联盟建立之初,依附国在联盟中地位较低,基本没有话语权,与主导国是不对等的地位。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后,自主诉求增强,对于主导国来说,其满足依附国的自主诉求,不仅

Glenn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in *World Politics*, Vol.34, No.3, July 1984, pp.461-495.

仅意味着既得利益的损失,更意味着控制力和优势地位的削弱,这是主导国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主导国认为优势地位削弱后难以控制盟友、主导同盟,进而难以从联盟自主—安全交易中获益,那么联盟新的自主—安全交易便难以形成,联盟内依附国和主导国矛盾会不断加深,双方利益的博弈会造成联盟的动荡甚至解体,如中苏友好互助同盟;如果主导国自信其在优势地位削弱后仍可控制盟友,主导同盟,进而从联盟自主—安全交易中获益,那么联盟新的自主—安全交易便容易形成,联盟内依附国和主导国会通过协商和正式协议确定双方新的权力和义务关系,经过调整后联盟会继续维持。联盟内主导国与依附国地位的变化象征着联盟主导权和权力关系的变化,依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自然会追求联盟内平等的地位,但主导国视权力为根本利益,不会轻易放弃,这种内在的矛盾对联盟原有的自主—安全交易是极大的“挑战”,同时对新交易的形成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联盟双方都是极大的挑战。

日本是日美同盟中的依附国,在联盟建立之初与美国的地位极不对等,其联盟政策更多的是对美国联盟政策的反应,没有话语权。在实力增长后,日本一直试图摆脱美主日从的不利地位,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同时无疑“挑战”了联盟建立之初的自主—安全交易。作为依附国的日本在联盟内努力打破美国的限制,意图实现美日地位的对等,这种利益诉求能否实现,新的自主—安全交易能否形成,取决于美国对自身控制力和日本对美国战略价值的判断。

三、美国对日本的纵容“调节”自主—安全交易

由于依附国实力增长的速度快于主导国,依附国实力增长的实现相较于主导国更容易,所以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后,主导国虽然国家实力仍明显强于依附国,但较之前的优势会逐渐减少,形成了实力的相对削弱。这种相对的实力削弱和依附国利益诉求的增强,促使主导国分担成本的动机增强,希望依附国可以在联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成本,以维持联盟的运作。此外,主导国在联盟管理中一直有被“牵连”的恐惧,在实力相对削弱后更加不愿意被联盟中依附国“绑架”,卷入到一些与自己不相关的冲突和战争中,这种恐惧的增加使得主导国倾向于鼓励依附国发展自身实力,提高依附国自己解决冲突的能力。具体到美日同盟中,美国是美日同盟中的主导国,其在美日同盟建立之初完全控制着日本,但在实力相对削弱后,美国要想继续维持同盟就必须做出让步,以继续利用同盟,并从中获益,从而在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一) 主导国实力削弱后的自主—安全选择

第一,自主方面分担成本的动机增强。在不对称联盟中,主导国通过为依附国提供安全保障,换取更多的自主,包括对依附国的控制力和利用与依附国的合作带来的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联盟建立之初主导国的自主—安全选择。主导国是联盟安全的提供者,通过军事援助、军事合作等形式保障联盟的安全,所以主导国是联盟公共物品的提供者,需要支付实实在在的费用。当主导国在联盟内实力完全占优的情况下,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份责任,因为依附国太过弱小没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而且依附国太过弱小,所消费的公共物品也较少,相对来说,主导国只是利用自己多余的一些安全资源来获取更多的收益,故也乐意为依附国提供公共物品;另外,依附国越小其支付的自主代价也越大,主导国的自主获益更大,主导国虽然提供公共物品,但收益明显仍大于成本。随着依附国实力增长,主导国的实力受到了相对削弱。主导国一方面对公共物品的支出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也对依附国“搭便车”的行为感到不满,在依附国实力增长后,主导国会要求依附国承担更多的成本和责任。

主导国在实力相对削弱后分担成本的动机增强,会要求依附国承担更多的成本和责任,这无意当中鼓励了依附国的自主扩张。但是,主导国对分担成本后自主获益的减少也是有准备的,因为主导国即使在实力相对削弱后,仍然拥有绝对强于依附国的实力,并且掌握着有利于主导国的联盟管理机制,其可以通过降低部分自主收益来分担更大的成本,这样保证了其在实力相对削弱后的收益仍占优。此外,主导国由于长期主导联盟,相信依附国对其的依附性很强,即使依附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获得更多的自主,仍旧无法摆脱主导国,所以主导国相信的分担成本后,主导地位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第二,安全方面被“牵连”的恐惧增强。在不对称联盟中,由于主导国是联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依附国提供保护,其在联盟中承担的责任很大,所以主导国从联盟成立之初就有着为维护盟约、保护盟友而卷入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并且这些冲突和战争往往与主导国利益不相关,所以主导国有被“牵连”的恐惧。相对于被“牵连”的恐惧,主导国往往不担心被“抛弃”(并不意味主导国其完全相信依附国的忠诚度,只是因为主导国对自己的实力十分自信,依附国的背叛成本很大,不会‘抛弃’主导国)。在主导国实力相对削弱后,对“牵连”的恐惧更加强烈:一方面实力相对削弱后主导国不再像联盟建立之初时那样实力绝对占优,主导国不能像之前一样完全控制盟友按其意志行事,这大大增加了主导国

被盟友“牵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主导国在实力相对削弱后，对自身管控危机和冲突的能力不再自信，会更加担心被盟友“绑架”，卷入与己无关的冲突，被“牵连”的恐惧加大。

（二）美国对自主—安全交易的“调节”

第一，做出让步，维持同盟。主导国作为既得利益者会努力维持联盟建立之初的有利局面，保证同盟的正常运行。所以在依附国实力增长、自主诉求增强、追求更多收益、“挑战”联盟自主—安全交易时，主导国会于联盟内安抚依附国，延缓依附国的自主倾向，主要采用谈判和拖延战术应对依附国的利益诉求。在拖延之后，依附国的诉求仍然很强烈的情况下，主导国会做出一定的让步，满足依附国的部分诉求，进而维持同盟，保证其在新的自主—安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主导国的这种应对方式是在其实力相对削弱后的最佳选择，但这种暂时的让步只能满足依附国短期内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协议保证联盟在一段时期内的稳定和发展。随着主导国和依附国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新形成的自主—安全交易又一次无法满足依附国的自主诉求时，主导国又会重复之前的策略，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谈判后，做出一些让步，满足依附国的部分利益诉求，于是联盟又一次形成了不同于之前的自主—安全交易，联盟又能稳定地发展一段时间。主导国和依附国将会陷入这样循环往复的行为模式中，直至有一天双方实力差距消失，联盟进行重大的调整，由不对称性联盟转变为对称联盟；或者双方利益重合性消失，联盟直接瓦解。值得注意的是，主导国在做出让步时，仍自信在让步后可以继续控制盟友，主导同盟，否则主导国不会做出让步。

美国是美日同盟的主导国，但美国也十分重视日本的利益诉求，往往会谨慎地应对日本的诉求，努力维持联盟的运作。而且随着日本承担责任的增加，战略价值逐步体现，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更加不会轻易解散联盟，相反在双方有摩擦和冲突时，美国会适度做出让步，满足日本的利益诉求。所以，在美国的主导下，美日同盟进行了多次调整，使同盟逐渐由地区同盟转变为全球性的同盟；从单一的军事安全防御同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美日完全不对等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变，逐步向平等的方向发展。这些调整是满足日本利益诉求的表现，也是美国从其国家利益和战略出发做出让步“调节”同盟的体现。

第二，利用同盟，巩固收益。联盟对于主导国来说，不仅是一种国家间的合作形式，更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主导国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联盟获得更

多的收益。即便是在实力相对削弱后,主导国也会利用其影响力和优势地位,在巩固既有收益的情况下,通过同盟获得更大的收益。所以,只要主导国仍能从联盟中获益,便会一直维持和利用同盟。在联盟建立之初,主导国获益良多,但在实力相对削弱后,主导国的安全资源也会短缺,为联盟提供安全保障和公共产品的压力增大,此时需要有人为其分担联盟运作的成本,减轻负担。主导国此时一方面会想办法降低联盟运作的成本,通过节约成本维持收益;另一方面主导国会通过分担成本来巩固收益,利用依附国在实力增长后的自主诉求,要求依附国支付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安全成本。双方在这点上具有利益的重合性,促成了新的自主—安全交易的形成。主导国利用依附国增长的实力维持联盟的运行,进而可以继续在其主导下利用同盟实现国家利益,巩固其在交易中的收益,无形中“调节”了联盟内的自主—安全交易。

作为美日同盟的既得获益者,美国努力维持联盟,以保证收益。在日本实力增长后,美国通过满足日本的部分利益诉求,让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在实力相对削弱后降低了自己在联盟管理过程中的成本,利用同盟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例如,在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后,美国获得了日本的大量援助,保证了美国从越南“体面撤军”。同时在美国的要求下,日本代替美国成为美国对亚洲援助的主要力量。日本虽支付了更多的成本,但也利用此契机,通过经济援助逐渐走向“政治大国”的目标。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国家行为,满足了日本的自主倾向,无形中调节了双方的利益冲突,促成了联盟自主—安全交易。

四、利益重合性是美日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

第一、利益重合性促成自主—安全交易。利益重合性是指国家间具有一致的利益或者互补性的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会影响国家交易之前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如果双方具有利益重合性,则收益便会大于成本,交易便可能会形成;双方不具有利益重合性,收益便不可能大于成本,交易便不会形成。当双方交易具有重合性时,如果重合性大,则交易后的收益显著,交易易于形成;如果重合性不大,则双方还会进一步仔细考虑,并进行反复的谈判,谈判成功则交易形成;反之,则不然。所以利益的重合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能否进行交易,以及交易形成的难易程度。

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本质上是权力让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需要掌握相关信息,熟知合作对象的偏好,判断对方是否会遵守协议,这便是国家交

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利益重合性使得国家可以坐在一起就合作关系进行广泛地讨论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会进一步了解,掌握对方的一些信息,可以弥补相互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成自主—安全交易。而且,国家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协商形成的交易和合作是双方共同认可且通过正式协议确立的,这保证了双方合作关系的合法性,决定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鼓励交易双方进行交易与合作。

第二、利益重合性缓解联盟管理中的困境。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不仅仅是解释联盟为什么建立的理论,更是解释联盟管理过程的理论。利益重合性不仅仅决定了联盟能否进行自主—安全交易,而且缓解了联盟管理中的困境。联盟管理中“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困境是联盟建立后不可避免产生的,其归根结底是源于国家合作与交易过程中的不信任。利益的重合性决定了合作的必要性,使得国家更加迫切通过相互间的交易获得收益,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会趋利避害,减少相互间的不信任,甚至是忽视联盟困境,以确保交易的形成。另一方面,利益重合性将合作双方联系在一起,无形中帮助双方建立了互信,使得彼此相信对方不会轻易破坏双方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关系,不会轻易背叛自己,这使得双方在联盟管理中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即使遇到冲突与摩擦,也会通过协商来协调利益,不会轻易触碰对方的关键利益,不会轻易背叛盟友,不会轻易破坏交易,不会轻易解散联盟。

第三、美日两国的利益重合性是美日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美日共同的威胁。威胁是联盟建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国家有共同的敌人或威胁来源,那么这些国家就更容易结成联盟,来威慑、对抗以致消除共同的威胁。美日同盟从成立到之后的每次调整都是建立在应对共同威胁的基础上的,每个阶段美日都有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对象。这是美日同盟利益重合性的重要部分,是美日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也是美日同盟一直维持发展的动力因素。在美日同盟建立之初,美日身处西方阵营,都面临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联是美国安全和霸权的挑战者,而日本处在东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苏联对其国家安全带来直接威胁,美日同盟建立之初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威胁;冷战期间,美日共同的威胁来源仍然是苏联,美日同盟内美日关系虽时有亲疏,但

参见田野:“关于国家间交易成本概念的一个思辨”,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69页。

都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和美日来自苏联的共同威胁下考量的；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由于共同威胁的消失进入“漂流”期，但很快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日本也在经济泡沫破裂后回归现实，认为中国作为其邻国，其实力的强大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安全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双方共同的假想敌和威胁来源又一次使得美日同盟经过调整后不断深入发展。

其二，美日的战略互补性。对于一个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谋求生存、发展和安全的大国，必须要有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国家战略的核心是国家利益，国家战略通过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表现出来。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系统内国家间的行动是相互影响的，所以一国的国家战略难免与别国的国家战略发生相互作用，有的表现为国家战略的相互冲突，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有的表现为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or 互补，带来国家间的合作。战略的互补性是国家利益一致的体现，具有战略互补性的国家会积极开展合作，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和共同利益的维护。冷战以来，美国的战略可以简单归纳为取得世界霸权，消除一切可能对其霸主地位带来挑战的因素。日本战略可以归纳为摆脱二战战败国的地位，逐步实现国家正常化。美国世界霸权的取得和维持是通过其遍布全球的盟友实现的，日本是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地位有赖于日本，需要日本的支持。而日本需要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改变其战败国的地位，通过美日同盟内对日本的松绑，逐步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进而提升其在亚太乃至世界的影响力。所以双方的战略具有互补性，美日双方通过美日军事同盟的方式实现合作，互相支持，具有共同利益。

其三，美日一致的价值观。国家在选择结盟时，除了关注权力、威胁、利益等传统现实主义问题，还会考量规范、认同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因为威胁的来源不仅仅是军事的，而且还来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结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身领土安全，而且还要保护自身的观念、价值和政治认同等。这种结盟不仅是军事上的结盟，而且是观念和价值上的结盟。例如，许多学者认为民主国家因为具有共同或相似的民主、自由、法治观念和意识形态，更容易进行合作，而且更倾向于结成同盟以对抗不同文化的国家。美国在选择盟友和制定联盟政策时一直努力践行其“共同理念”，例如《日美安保条约》序言中就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国，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关系且维护民主、个人自由和法治

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第21页。

黄刚：“冷战后美日同盟：建构主义的解释”，载《国际观察》2002年第1期，第17页。

原则。”因此，美日在政治理念和身份认同上具有一致性，美日一致的价值观从根本上和认知上促成了美日合作，美日以此为基础开展自主—安全交易，建立并管理联盟，美日联盟得以不断深化发展。正如日本前外务次官栗山尚一所言，“日美有共同的价值观，这是日美关系的根本，可以保证两国在基本方向上不会发生对立。”

结论

通过对以上三个假设的验证可以发现，美日同盟的发展历程，是美日之间不断进行自主—安全交易的利益博弈过程，美日通过复杂的交易实现各自的目标，可以避免因具体问题的分歧而陷入直接对抗，美日在联盟内实现了利益的妥协，保证了美日同盟的持续巩固发展，其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为日本自主性的扩张和美国对日本的纵容。美日在数次交易博弈之后逐渐形成了自主—安全交易机制，这种机制规范、引导、约束成员国的行为，反过来影响国家的自主—安全选择，进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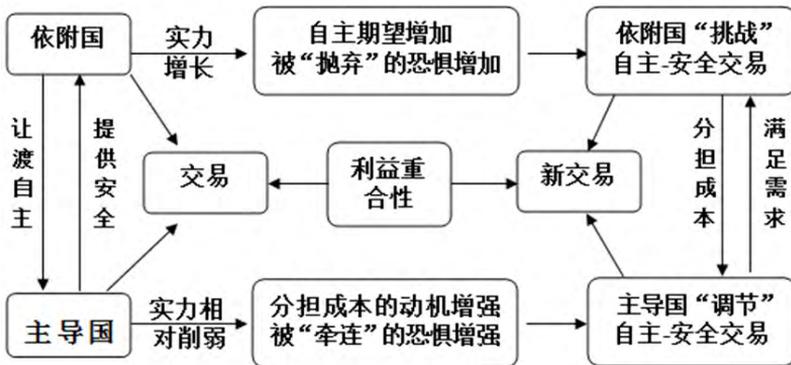


图 1 非对称联盟中的自主-安全交易示意图

根据现有联盟自主安全交易理论及美日同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三个假设的验证，本文归纳出非对称联盟中自主—安全交易的一般逻辑（如图 1 所示），其具体表现为：联盟在建立之初，依附国让渡自主权以获得安全收益，主导国提供安全产品以获得更大的自主收益。随着联盟内成员国实力的变化，最初交易形成的平衡会发生变化，依附国在实力增长后自主期望增加，被抛弃的恐惧增加，便会通过分担更多成本来获得更多自主权，这对之前的自主—安全交易形成了

王公龙：“对日美同盟‘再定义’的再认识——以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视角的选择性分析”，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5期，第22页。

“挑战”。主导国在实力相对削弱后，分担成本的动机增强，被“牵连”的恐惧增加，便会满足依附国的自主需求，对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起到了“调节”作用，促成了新的自主—安全交易。利益重合性是每次自主—安全交易的基础，保证了交易的可行性和协议的达成。联盟的自主—安全交易机制影响了国家间的行为模式，促使成员国在联盟内通过协商与交易来解决冲突和矛盾，保证了联盟的稳定运行，决定了成员国的联盟政策，进而影响了联盟的走势。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济南，250100；牛建，山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太谷，030801）

收稿日期：2016年8月

（责任编辑：赵裴）

Research on the Autonomy-Security Transac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Yang Luhui Niu Jian

Abstract: The US-Japan alliance is built on the bases of autonomy-security transaction. With the changing of autonomy-security demands caused by the changing of national strengths between those two countries, both sides are trying to balance their interests.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three hypotheses as follows: (1) The autonomous expansion of Japan is challenging the autonomy-security transaction; (2) the connivance attitude toward Japan's autonomous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autonomy-security action; (3) mutual interests is the foundation of alliance's autonomy-security transaction. By testing the above hypothesi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l logic of autonomy-security transaction in the asymmetric alliance.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US-Japan alliance is not only the choice of national interests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rade interaction.

Keywords: US-Japan Alliance; Autonomy; Security; Transaction